



華人財團大觀

林圖 林耕



四川人民出版社

(川)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谢 雪
封面设计：刘毅敏

华人财团大观·海外卷

林国 林耕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益通街 3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市教育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17.75 插页 4 字数 400 千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0—04094—6/C · 285 印数:1—5000

全三册 定价:98.00 元

我们都是立足于振兴中华民族，口号是振兴中华。不管怎样，我们都是一个根，但如果光是根深蒂固，不发扬光大，我们都是没有什么光彩的。我们人口这么多，地方这么大，要急起直追。

——邓小平 1987年5月16日会见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美国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化学系教授
李述哲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李政道及其夫人秦惠君时的
谈话。

我们还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邓小平 1990年4月7日会见
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
时的谈话。

目 录

分序——从拯救中华到振兴中华	(1)
林绍良家族与三林财团	(28)
李文正家族与力宝财团	(42)
黄奕聪、黄鸿年家族与金光财团、中策财团	(80)
谢建隆家族与阿斯特拉财团	(102)
彭云鹏家族与太平洋财团	(113)
林春和家族与大象财团	(119)
黄奕住家族与日兴财团	(126)
黄仲涵家族与建源财团	(136)
李光前、李成伟家族与南益财团、华商银行	(143)

蔡志勇与蔡氏金融百货公司.....	(357)
王嘉廉与联合国际电脑公司.....	(363)
王安博士与王安电脑.....	(370)
谭仲英与麦克罗斯钢铁公司.....	(385)
应行久家族与大中集团.....	(392)
李学海与威特、柏泰集团	(398)
美国金融界升起的两颗女明星:陈文玳与梁淑仪	(402)
魏文华与苏氏珠宝集团.....	(406)
林思齐家族与加拿大国际房地产集团.....	(414)
谭正清与东方精密铸造集团.....	(422)
谭振樵家族与天利公司.....	(429)
孙忠利家族与孙氏财团.....	(435)
吴百福家族与日清集团.....	(442)
林瑞荣家族与微笑堂.....	(445)
李明治与联合财团.....	(448)
毕务国家族与东方开发财团.....	(454)
林训明家族与石化事业投资集团.....	(464)
塞贡多·王与太平洋香蕉王公司.....	(473)
戴宗汉家族与库尔坦博农场.....	(478)
陈开恩家族与陈氏集团.....	(483)
谢桂亮家族与谢氏果菜农场、杨汶钊家族与杨氏 蔬菜农场.....	(487)
司徒协麟家族与麟跟集团.....	(492)
潘洪江家族与友和集团.....	(495)
沈文伯家族与北方搪瓷集团.....	(500)
陈福胜与马岛甘蔗种植园.....	(506)

附录：

- 张弼士——世纪之交华侨首富、中国民族资本
元老 (510)
- 张榕轩、张耀轩兄弟——潮汕铁路的倡办者 (520)
- 简照南、简玉阶——中国烟草工业的先驱者 (525)
- 陆佑——马来亚的开发先驱者 (531)
- 叶亚来——吉隆坡市的奠基者 (539)
- 郭通——越南胡志明市的开埠先驱 (546)
- 罗芳伯——西加里曼丹的开发先驱者 (551)
- 黄乃裳——沙捞越的开发先驱者 (556)

从拯救中华到振兴中华

——海外卷分序

自秦始皇起，不仅中国第一次实现了国家统一，而且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了。“汉威令行于西北，古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令行于东南，故蛮夷呼中国为唐。”^①因此，外国人曾经先后以“秦”、“汉”、“唐”来称中国。

专家们认为，华人从“四海之内”的中国疆域向“四海之外”移居的历史，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从南宋初年（12世纪初叶）至明代中期（16世纪中叶），前后约450年，为华侨形成时期，人数估计在10万以上；从16世纪中叶至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前后约300年，为开发南洋时期，人数估计在100万以上；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约110年，为契约华

^① 朱彧：《萍州可谈》。

工时期，人数估计在 1000 万以上；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为经济发展时期，总数估计有 5000 万之多。对此，邓小平在 1990 年 4 月 7 日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时指出：“我们还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① 到 90 年代中期，包括港澳、台湾在内，华人所拥有的资本已经占全球资本总和的 40%，成为世界三大资本之一。

抚今追昔。虽然，华侨形成于南宋之际，但是，“华侨”一词却于 1883 年才出现在少时去过南洋、壮时出使南洋的郑观应《稟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为招商局与怡和、太古订立合同》中。郑观应的奏章云：“凡南洋各埠华侨最多处，须逐渐布置，亦派船来往。”翌年，他又呈文：“各岛华侨咸切故乡之感念”，“各国商人虽百余数十人，无不设立领事，独我国未有，华侨之受苛虐，无处可伸，亦大憾事。”就是这位郑观应，最早疾呼：“商场似战场”、“商战似兵战”，并写下檄文——《盛世危言》。

鸦片战争既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又是华侨史的转折。正是鸦片战争，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贩卖鸦片”与“贩卖猪仔”，在中国继续进行着“血与火”的原始积累；既掠夺货币，又掠夺劳动力。1868 年强迫清朝政府签订的《蒲安臣条约》，就是第一个“契约华工”——“贩卖猪仔”条约。接替蒲安臣担任美国驻华公使的田见曾一语道破：“这是一个取得廉价劳动力的条约。”当时，澳门、香港、汕头、厦门是“贩卖猪仔”的四大港口，而新加坡、槟榔屿是“贩卖猪仔”的两大集散地。据不完全统计，从 1881 年至 1930 年的 50 年间，到达英属海峡殖民地的华侨共约 830 万人，其中“猪仔”约有 600 万人。之所以西方殖民者强迫清朝政府签订“契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58 页。

约华工”条约，乃在于美国西部、加拿大西部、澳大利亚、南非已经发现金矿，迫切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去开采；美国与加拿大为了开发西部，需修筑横贯东西的铁路，亦迫切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去铺路；加上当时黑奴已经解放，更需要“黄奴”去顶替；尤其重要的是，贩卖“猪仔”这种劳动力商品比起贩卖鸦片更能获取巨额利润；此外，西方殖民者已经把东南亚置于殖民统治之下，从掠夺原料与占领市场出发，也需要大批廉价劳动力去开发。因此，“贩卖猪仔”本身成了一箭三雕的原始积累，既掠夺了廉价劳动力（比英国的“圈地运动”与海外的“贩卖黑奴”更有利），又榨取了巨额利润，还开采了货币本身——黄金。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广东、福建两省农民，许多人被迫背井离乡，或卖身为奴，或出国谋生，这就是近代华侨的来历。因此，华侨“身在异国，心在祖国”。“拯救中华”成了华侨的共同心声与一致行动。

“拯救中华”这一庄严口号，本身就是华侨率先在辛亥革命中提出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五次伟大的“拯救中华”的革命运动。在每次“拯救中华”的革命运动中，都有华侨所建立的丰碑。辛亥革命即是华侨孙中山与吴玉章首先在华侨中发动的，因此孙中山总结出“华侨乃革命之母”这一真理。

“振兴中华”这一庄严口号，本身也是华侨抱着“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崇高理想，与“拯救中华”的庄严口号几乎同时提出的。这两个庄严口号，大体可以划分为两个既不能截然割断又承前启后的历史阶段。之所以需要划分，是因为尚未“拯救中华”安能“振兴中华”？之所以不能割断，是因为在拯救中华的历史时期已经有振兴中华的实际行动，况且只有振兴中华才能从根

本上拯救中华。这就是《义勇军进行曲》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缘故；也就是，每当国际赛场上响彻这曲国歌时，所有华夏子孙都为之热血沸腾的理由。

振兴中华，是 1990 年在新加坡召开的“南洋学会成立 50 周年纪念暨迈向 21 世纪的海外华人社会”国际研讨会的主题之一，也是历届世界华商大会的主题之一。把振兴中华作为世界华人与华商盛会的主题之一，充分表达了 5000 万海外华人尤其是华商的共同心声。

在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创造性、历史性地先后创建了珠海、深圳、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与海南、上海浦东两大经济特区，开放了沿海 14 个城市，开辟了珠江下游、闽南、长江下游三个三角洲，设立了一批保税区，开设了一批边贸口岸，建立了一批高新技术开发区，创造了外商独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人股、外商收购诸种新型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这一切，使境外、海外华资振兴中华有路、报效祖国有门。与此同时，中国大陆也在境外、海外投资。中国大陆的政府部门、公有经济在境外、海外独资、合资、合作创办的经济实体，也应当看成是列宁关于新型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构想的新实践、新发展。

就是在这两种新实践中，一个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带正在形成，一个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华南经济圈已经形成，一个以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为“稳定三角”的中国经济圈正在形成，一个以中国经济圈为辐射与吸纳中心的中华经济圈正在形成。可以说，一个“华人世纪”即将到来。

本序将着重探讨以经济特区为实验地与以外商独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人股、外商收购为新型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

的创造性、历史性实践。从中人们可以看到海外华人尤其是海外华商对振兴中华所作出的贡献。

拯救中华的历史回顾

温故而知新。华侨、归侨为拯救中华建立了不朽历史功勋，尤其是辛亥革命时期与抗日战争时期。

为了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出现了两股出国潮流：东渡日本留学与旅欧勤工俭学。在这两股潮流中，吴玉章都是发动者。1903年，吴玉章与仲兄吴紫光一起东渡。他在诗中写道：“不辞艰险出夔门，救国图强一片心；莫谓东云皆落后，亚洲崛起有黄人。”到达东京后，他就与成城中学校长冈本则录商洽，为中国留日学生专门开设中学班，并与1901年第一批到达日本的四川留日同学发表《劝游学书》。1905年，孙中山从檀香山来东京，并将革命活动中心从美国移到日本。是年，与吴玉章一拍即合，在东京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有纲领、有组织的革命政党——中国革命同盟会。以四川留日学生为主体的中国留日学生在吴玉章动员下，绝大多数都先后加入了同盟会，而且这批同盟会四川会员后来都成了辛亥革命前奏的四川保路运动的中坚。1907年，吴玉章在东京创办《四川》杂志，再次动员四川青年学子留学日本并鼓吹革命。1911年3月，吴玉章与黄兴奉命回国策划与领导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逃回日本。同年5月，孙中山又派吴玉章回国，领导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保路运动。在以吴玉章为首的同盟会的领导与发动下，成都起义一触即发，于是清廷不得不从湖北调兵遣将，企图镇压。结果，从湖北来的刽子手端方被吴玉章亲自指挥的革命军所杀，在成都镇压起义的四川总督赵尔丰也被保路同

志军所杀。正是由于四川保路运动以同盟会得胜、清政府惨败而告终，湖北清政府兵力受到严重挫伤，同盟会所领导的武昌起义才能于同年10月10日取得成功。因此，如果没有吴玉章领导的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保路运动或成都起义的胜利，就不会有同盟会领导的武昌起义或辛亥革命的成功。成都、重庆光复后所成立的四川军政府与蜀军政府，是辛亥革命过程中诞生的最早的革命军政府。

武昌起义成功了，但是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并没有灭亡。于是，孙中山又派四川成都金堂县（今清白江区）人彭家珍回国，到北平伺机进行刺杀活动。1912年1月27日凌晨，彭家珍去刺杀窃国大盗袁世凯，结果却把清廷的真正统治者——宗社党党魁良弼炸死，加速了封建王朝的崩溃。此后不久，宣统皇帝宣告退位，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覆灭。同年同月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追授彭家珍为陆军大将军，并令崇祀忠烈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毛泽东亦立即授予彭家珍“永垂不朽的革命烈士”的光荣称号。

辛亥革命之后，吴玉章深感拯救中华任重道远，于是次年就在成都成立四川留学勤工俭学分会，并于1914年旅欧勤工俭学。到达法国后，就与蔡元清、李石曾、法国议员穆德、法国教授欧乐共同成立华法教育会与勤工俭学会。1916年，与蔡元培一道回国后，就在北平创办勤工俭学会预备学校。由此可见，第二次旅欧勤工俭学、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出国潮流，吴玉章既是先驱者又是发动者。1961年11月29日，吴玉章曾赋诗悼念赵世炎、陈延年二同志就义34周年。诗中有“留法青年俊杰多”一句。赵、陈两人都是吴玉章创办的北平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第一批学生。赵世炎旅法勤工俭学期间曾任中国少年共产党以及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第一任书记，回国后曾接替壮烈牺牲的陈延年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

记，1927 年英勇就义。吴玉章曾经说过：“赵世炎同志是我最优秀的学生，又是我的革命引路人。”这里指的是，1925 年吴玉章与赵世炎在北平重逢时，方知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上海成立，于是他解散了由他与杨闇公创建的、有刘伯承同志参加的中国青年共产党，并由赵世炎介绍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青年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之外，1921 年旅日归侨王右木在成都还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李鹏的父亲李硕勋，就是 1921 年在成都结识了吴玉章与王右木之后才走上革命道路的。正因为成都市与这位“中国革命五老”之首的吴玉章的革命生涯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吴老对成都的往事旧情也感怀至深，在其三首提到锦城的诗中，有两首是忆念杨闇公和悼念李硕勋的。在《忆杨闇公》一首中诗云：“锦城五一举红旗，革命风云壮华西。为救万民于水火，不辞千里转成渝。”在《悼念李硕勋烈士》一首中诗云：“锦城初识羨英华，有志男儿爱国家。北伐从军趋武汉，南下转战别流沙。”

在抗日战争时期，华侨的拯救中华的可歌可泣事迹，不胜枚举。

1939 年 8 月 14 日，侵华日军出动自称为王牌的木更津轰炸机队，疯狂轰炸南京、句容、杭州 3 个中国空军基地，中国空军组成以华侨飞行员陈瑞钿、黄拌扬、黄新瑞为主力的阵容迎头狙击，这是抗战爆发后第一次对日空战，在这次史无前例的空战中，3 位热血沸腾的归侨空军勇士，一举击落敌机 6 架，而且中国空军无一伤亡，因此当时国民政府将 8 月 14 日定为中国空军节。1938 年 5 月，陈瑞钿在武汉的对日空战中，又一人歼灭敌机 3 架，于是同年夏陈瑞钿由于战功显赫而被晋升为第五大队第 28 中队队长，1939 年 10 月，陈瑞钿与其他 3 名战友赴柳州接收已修复的 4 架英制驱逐机，并立即参加昆仑关会战，再次击落敌机二架、击伤敌机一架，

使昆仑关空战以我方全胜、日军惨败而告终；不幸的是，同年12月15日陈瑞钿在执行护卫苏联援华轰炸机志愿队任务时，飞机被击中起火，人因而受重伤，虽返美国治疗，但仍留下终生残疾。黄拌扬于1938年夏也由于战功显赫而被晋升为第五大队第29中队队长；在担任中队长之后又一人在对日作战中歼敌机8架，1940年11月又被晋升为第五大队长；1941年1月他率领第五大队赴新疆乌鲁木齐接收苏联援助的22架飞机，后来他驾驶苏式飞机参加空战时，不幸身负重伤，也返美国治疗，并伤残定居美国。黄新瑞一直是黄拌扬的亲密战友，黄拌扬负伤后，他接任第五大队队长，并第二次赴乌鲁木齐接收所余18架苏式飞机，黄新瑞在对日空战中，战功更为辉煌，一人先后击落敌机17架，1942年3月14日，由于空军总指挥部的指挥失误，黄新瑞及第五大队12名官兵在保卫成都的对日空战中全体为国捐躯。在这次保卫成都的对日空战中壮烈牺牲的华侨空军英雄，尚有从南洋回国参战的分队长林日增与江东胜。

马俭进在加拿大华侨为支援祖国抗战而创办的航空学校毕业后回国参战，由广东空军派往德国受训一年，1939年被派到驻成都的航空委员会轰炸总队协助美国技术人员工作，是年7月25日他与队长刘福洪、僚机刘俊一行驾驶3架飞机奉命从成都凤凰山机场出发，执行奇袭山西运城日军机场的任务，一举炸毁敌机30余架，立下盖世战功，后来在执行一次运输任务时，不幸油尽迫降失事，双臂折断；抗战胜利后，他重返加拿大，80年代后移居美国。中国的第一个女飞行家张瑞芬与第二位女飞行家李霞卿及被美国航空界誉为“东方女飞将”的辛亥革命烈士秋瑾的女儿王灿芝，都是当年回国参战的美国华侨。据不完全统计，1939年7月至1942年底，华侨一共为祖国抗战捐献了217架飞机，广东空军几乎全部

由华侨航空学校培养出的飞行员组成。倘若没有华侨捐献的这么多飞机、输送这么多的空军英雄，中国将会遭受更惨重的损失，就是美国也会在太平洋战争中蒙受更惨重的损失。

在最伟大的“拯救中华”的抗战中，人们也不应忘记一位反细菌战的华侨杰出战士——陈文贵。他 1902 年生于四川的永川县，1922 年入湘医学院，1926 年因作为赞成北伐战争的学生会会长而被开除，入叶挺师当卫生队队长，并随叶挺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不幸被捕，经非人折磨才终于逃出虎穴；1928 年续入华西协和大学，1929 年夏获医学博士学位，1934 年秋奉命同国际同盟驻华顾问史丹巴博士赴西宁筹建青海卫生实验处，1939 年春又被派往广西创立桂林鼠疫防治所；同年赴美入哈佛大学医学研究所进修，回国后被派往香港、新加坡、印度的孟买、斯里兰卡、印尼的万隆与爪哇考察鼠疫防治工作；回国后，被派往西安第一防疫大队任队长，负责西北战区包括八路军的防疫工作，其间赴延安会见廖承志与边区医院院长傅连璋，并在延安成立第四分队，因擅自赴延安并成立第四分队而被撤去第一防疫大队队长职务，愤而回公共卫生人员训练班，兼贵阳医学院细菌学教授；1940 年初出任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检验学指导员兼军医署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检验系主任教官，同年秋日军在宁波投掷细菌炸弹，死亡 98 人，陈文贵义愤填膺地在重庆全国防疫工作会议上谴责日本法西斯的这一滔天罪行，1941 年初受中国红十字会之托赴贵阳筹建由美国华侨捐赠 2000 美元价值的药品和药械的疫苗血清制造室，1942 年秋日寇又在常德投掷鼠疫与霍乱细菌炸弹。陈文贵不畏艰险前往调查，并写出揭露这一滔天罪行的详细报告，这一报告成了 1949 年在苏联伯力审判日本关东军总司令以及 12 名细菌战犯时的不容辩驳的证据；1952 年初美军也在朝鲜发动细菌战，陈文贵奉命任中国人民

志愿军卫生部顾问兼检疫队队长,写出了揭露美军步日本法西斯之后尘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备忘录》,他在这一震惊世界的《备忘录》中写道:“我有机会参加两次反细菌战的检疫工作……我现在愿以揭发日本及美国法西斯战犯的罪行来唤起全世界公正的科学家们的注意。”1952年10月,陈文贵以反细菌战的伟大战士与细菌专家的双重身份,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在会上揭露美国侵略军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的罪恶行径。陈文贵在反细菌战中的卓越贡献,被朝鲜政府授予二级国旗自由勋章,被国务院授予全国爱国卫生运动模范称号。1974年陈文贵病逝于四川医学院副院长职上,享年74岁。

在这场最伟大的“拯救中华”的爱国运动中,世界各国的华侨都团结一心,成立了支援祖国抗战的组织,规模最大、贡献最多的要算1938年10月10日在新加坡成立的南洋各埠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马来西亚富商、侨领陈嘉庚被选为主席,菲律宾富商、侨领李清泉与印尼富商、侨领庄西言被选为副主席。陈嘉庚发出铿锵而朴实的号召:“我们如果终日只知赚钱,不知救国,纵然发了财。但是作奴隶,做亡国奴,发了财有什么用。”在陈嘉庚为首的“南总”的领导与发动下,“富商巨贾,既不吝金钱,小贩劳工,亦尽倾血汗。”于是,1937年至1941年华侨捐款共达1,322,532,662元国币,1937年至1942年华侨购买救国公债共达11亿元国币,仅这3项就达36.5亿元国币,据估计已占当时华侨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就是在世界各地的华侨抗战组织尤其“南总”的领导与发动下,组成了南洋华侨机工队、东江纵队、琼崖纵队、闽南抗日游击队。他们在《告别南洋》的雄壮歌声中高唱:“再会吧,南洋,你不见尸横长白山、血流黑龙江,这关系着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别了吧,我们的第二故乡,我们要去争取祖国的自由解放!”